

關於“牢騷太盛”與“當代完人”的哲學思考 ——柳亞子、陳布雷比較論

劉景松*

“文有南社、武有黃埔”，南社的政治色彩長期攫人眼球。該社不少成員乃不折不扣的政治人物，那些知識分子出身的社員，則因自己的時代抉擇而與政治牽扯不清。而柳亞子和陳布雷與黨國高層的密切往來，就頗有知識分子與政治領袖的“聯姻”性質，糾纏其中的歡愉恩怨也因此備受矚目。

一、由報界書生到君側紅人

早在求學階段，陳布雷就套用宣傳用語“驅除韃虜、光復漢室”入文，表達自己的革命意志。受聘《天鐸報》期間，所作系列《譚鄂》政論文章，展露出非凡的時局慧識與政治學養。曹錕賄選事件發生後，陳布雷主編的《商報》以第一版全版的版面，用大號鉛字排印，配以照片，刺之為“捐班總統”。1926年，社友邵飄萍被軍閥以“赤化”罪名殺害，陳布雷即夜撰文譴責：“入民國以來，除袁世凱軍政執法時代外，未有不顧法律，不重人權，下如此駭人之手段也”。¹

針砭時弊、敢言直諫乃報人的職業品格。陳布雷仰仗手中筆，在輿論的汪洋中掀起滔滔巨浪，既是知識分子拯世情懷的道義擔當，又是報人言論力量的強大表現。不計安危，無所畏懼地將筆鋒刺向權貴，這是個體精神氣質的彰顯，是民間猛士錚錚光芒的折射。在正確時機選擇一條激昂正途，自然能夠得到同道的呼應與支持。為此，柳亞子作詩《贈陳布雷》，以“喜汝能青眼”、“雄文接竊冥”相稱譽，並寄盼彼此建功立業，“平胡虜”、“共勒銘”。²

陳布雷的表現搏得報界同行稱讚，也引起政界高層矚目。為示慕重，蔣介石委託邵力子轉贈親筆簽名的個人戎裝照，並透露“很盼望與君相見”。蔣、陳首次會晤後的第四天，陳布雷就加入國民黨，成為組織意義上的一名黨員。出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五個月後，陳布雷返回上海，先任《時事新報》特約撰述，再任總主筆主持社論，繼續其報人生涯。此期，陳布雷並非每天跟隨“委座”左右，他更像一位“應召秘書”，只要南京方面需要，就即時乘坐火車，從上海

一路“啞啞啞啞”趕去，為最高統帥捉刀。

倘以傳統仕進標準衡量——從報界掉頭扭身，跨入地位顯赫的政界，與高層政治人物相對，直接為“領袖”服務——陳布雷的人生旅途業已實現了某種“超越”：他已經將自己從純粹的報界空間超脫出來，從相對窄小但能夠展示民間力量的空間超脫出來，而與原先所抨擊的政治世界建立起更直接廣泛的聯繫。順此超越，陳布雷的思想觀念、人生情趣、榮辱觀念勢將發生變化：他願意並試圖通過政治力量、通過文化與政治的聯姻去實現自己的理想，願意將自己以及發源於民間的力量依附於政黨，將改變國家頹勢、振興民族的希望寄託在“君王”身上。既然委身政治，為之努力，那麼，隨後一系列問題的思考也就順理成章地由社會問題轉向政治問題，由此導致思考立場由民間向廟堂靠攏。

陳布雷撰寫的《告黃埔同學書》、《祭告總理文》、《十年來革命經過之回顧》、《敵乎？友乎？》等文告廣受傳誦。但這些文獻，畢竟只是秉承“旨意”的文字串連，而非肺腑心語。陳布雷機械地揮動手中筆，在政治的囚套中點、橫、豎、勾，完全失去了早期“布雷”鳴叫的原生態氣勢，失去了“畏壘”的轟鳴內蘊。這些筆墨，連同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》、《告國民書》、《勝利須賴長久之奮鬥告全國軍民書》、《抗戰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》等宏文，既談不上甚麼學術價值，也無太多實際意義。

蔣介石五十歲壽辰時，陳布雷以《報國與思親》為祝壽文。三年後，陳布雷五十歲生日，蔣介石以“寧靜致遠 澹泊明志”訓詞回贈助手。應該說，“寧靜致遠 澹泊明志”連同陳布雷死後的“當代完人”牌匾，既是蔣介石對陳布雷的評價，又是君主對僕人的授獎。遺憾的是，陳布雷忘記了自己是一名在新聞界叱吒風雲的勇猛書生和政論家，他被外界欽仰的是筆挾風雷的批判與戰鬥精神。知識分子監督社會、擔當時代職責的使命既被“服務黨國”、“效忠領袖”充斥，批判的棱角也就蕩然無存。對於圈養之士，淪為馴服的“君側紅人”，我以為，縱褒獎萬千亦不抵樵夫漁佬的掌聲一片。

* 汕頭大學文學院副教授

柳亞子曾經自封維新黨人，後受盧騷(梭)“天賦人權”說影響，為自己取名“亞騷”、“亞盧”，及至傾慕愛國詞人辛棄疾，再改名“棄疾”。在上海讀書期間，章太炎以暗含蔑視當朝帝皇的“某某人本紀”為題要求學生作文，柳亞子當即寫就《柳人權本紀》，表現了一名書生敢於“犯上”，無畏當權者的堅定志向。

相繼加入同盟會和光復會，標誌着柳亞子由意氣式書生轉向成熟的革命者。針對康有為吹噓立憲能使“民權既得，兆眾一心，君民同治，中國從茲不亡”，認為“中國只可行君主立憲，不能行共和革命”；梁啟超主編的《新民叢報》散佈革命可以生內亂、致使列強入侵，國家會遭受瓜分等言論，柳亞子接連發表《考察政治者還國矣》、《祝賀立憲之醜態》、《立憲問題》等文章回擊，指出立憲是為愚漢，清廷及其走狗“借立憲之美名以為籠絡人心”，有力地聲援了革命輿論宣傳運動。

武昌起義爆發不久，柳亞子即與社友朱少屏合辦《警報》，傾全力報道前方消息。社友周實在南京計劃起事遭清吏暗殺，柳亞子作《哭周實丹烈士》，又發表《周烈士實丹傳》讚揚他“一朝見危受命，慷慨慕義，奮為鬼雄，賢者不可測，亦足為我南社之光矣。”³

在反清、討袁鬥爭中，柳亞子都能最大程度地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。即便身為國民黨“三賢”之一，性情剛烈的他在黨內也絕少委蛇處世。相反，在揭露黨國黑暗殘暴的真面目時，筆下絕不留情。當廖仲愷被害的消息傳來，這位擔任總統府秘書三天即掛冠而去的硬漢，率先陳詞：

亂草斜陽哭墓門，從知人世有煩冤。
風雲已盡年時氣，涕淚難乾袖底痕。
何止成名嗾阮籍，最憐作賊是王敦。
匹夫橫議誰能諒，地下應招未死魂。⁴

對暗殺行為痛加譴責，並得到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，從而掀起嚴懲兇手及其幕後主謀的輿論熱潮。當綁架暗殺潮洶湧蔓延的時候，柳亞子為寓所取名“活埋庵”，傳遞出“庵主”置生死於不顧，隨時為革命事業捐軀的思想準備。而“復壁事變”⁵的發生，使柳亞子對黨務心灰意冷，與國民黨掌權者的關係亦日漸疏離，凡此種種，無不逼迫使柳亞子對政治選擇做重新思考。

柳氏堅信毛澤東將是締造新中國的偉大人物，共產黨將是未來神州大地的主宰者。最是《延安一首五月二十六日賦寄毛主席》：

工農康樂新天地，革命功成萬眾和。
世界光明兩燈塔，延安遙接莫斯科。⁶

一股憧憬光明未來，嚮往新主義新生活的氣息溢於言表。不難看出，此刻柳亞子的思想情感已經與國民黨陣營脫離。隨着政治立場的位移與現實鬥爭的轉向，他完成了步履的調整，與時俱進地把目光投向另一塊廣闊天地。

柳亞子與毛澤東初識於1926年，1945年二人重

逢。這是毛澤東作為共產黨領導者與蔣介石談判而來。期間毛澤東邀見包括柳亞子在內的民主人士，聽取與會者對國家前途的看法。柳亞子賦詩《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》：

闊別羊城十九秋，重逢握手喜渝州。
彌天大勇誠能格，遍地勞民戰尚休。
霖雨蒼生新建國，雲雷青史舊同舟。
中山卡爾雙源合，一笑昆侖頂上頭。⁷

其政治取向彰彰可見。毛澤東對柳亞子給予“先生詩慨當以慷，卑視陸游陳亮，讀之使人感發興起”的高度評價，柳亞子則表達了“驥尾追隨倘許從”的盼望。當柳氏筆底瀉出“太陽出來滿地紅，我們有個毛澤東”詩句；當站立天安門城樓，信筆搖來“不是一人能領導，哪容百族共駢闐？”而毛澤東和詩“詩人興會更無前”時，一對知識分子與開國領袖的特殊組合就此宣告誕生。

二、關於“牢騷太盛”與“當代完人”的比較解讀

陳布雷以做事用心投入而受新聞界稱頌。在接受鄒韜奮採訪，說起“先生在商報時代，反對曹錕賄選的文章最有精彩”話題時，“他說他那個時候對這個問題，全從道德方面着想，法律尚在其次。在曹錕是破壞中國傳統的道德，在他心裏簡直覺得曹錕是和他個人為仇，所謂‘恍若身入其中’，所以能言人所欲言。”⁸

“……我問陳先生對於人的態度有何見解的地方，陳先生說這個問題太大了。他自己的見解，是以嚴正的自覺律己，以寬博的胸襟處世，他說個人對於世界應當多少有一些貢獻，但是最大的貢獻，須是最適的貢獻。他說他不願做超過自己能力的事情，不願勉強擔任超過自己能力的職務；他覺得世間最浪費的事是勉強擔任與自己性質不相宜的事情。他寧願過心安理得的刻苦生活，不願過表面浮華而內心感覺空虛的生活。”⁹

不作高蹈之談，沒有豪言壯語，陳布雷質樸誠懇的“貢獻說”，放在今天同樣惹人好感。可惜這位口口聲聲“不願入政界，理想的職業還是在新聞界”的幕僚長，一旦晉身國軍帳中，他就不由自主地違背了原初意願：為時局、為“領袖”、為“黨國事業”超負荷運轉，以致本已虛弱的軀體早早“病象日增、健康日損、腦力益衰”，年不及耳順即告衰竭不振。在追隨蔣介石的日子裏，陳布雷以其出色的工作屢受讚賞，但這讚賞只出自一人，實際上並無多大意義。陳布雷沒有承繼當初在報界的雷鳴氣勢，他把自己善於揮灑的舞台荒棄一旁，卻兢兢業業於侍從室。這位識時務者，歸根到底又是糊塗蟲。他得到了一個人一時的寵愛及提攜，但卻失去千千萬萬人長久的厚望與敬重。他雖反省並再三表示“願意留在報界而不願從

政”，但一旦念及總裁之恩遇，所有的反思頃刻間便告風流雲散，這恰恰說明陳布雷的反思只是在身心疲憊之時，等到歇過一氣，緩過神來，反思就無從談起。這種反思的飄無不定性反過來又證明了陳布雷對於政治事務(刀筆吏務)的熱衷與醉心。

長期以來，政界與政治人物成爲思維定勢的“中心”，而報界及報人則淪爲社會框架中的“邊緣”和邊緣族群。報人缺少專制機器和冷熱兵器，其優勢在於盡可能借助文字，以自己的話語宣揚政治思想，期冀醒世人於昏睡之中，振民心於頹敗之際。陳布雷缺乏實際的治國經驗——他只是一個報人騷客而非政客武夫，以報人之身，躍過自己的職責範圍去思考政治軍事問題，其思考屬於易位思考：儘管可能有三五拾獲，但這些拾獲充其量只是不成系統的理論碎片，很難比純粹的軍人政客的思考高明多少。這就註定陳布雷固有的思想非但不能得到豐富發展，甚至難以避免地遭到削弱、淡化、縮減。選擇向上走一步——由報館通往府邸、高牆，其形象固然“高大”，步履中也投映着“正統”派頭，但發自民間的正義呼聲蛻化爲定期的喉舌社論，在民眾聽來也就毫無疑義地變質變味了。

接受新知識洗禮的陳布雷，終究沒能掙脫舊式文人的愚忠情結。“家人嘗勸我：你這樣的衰弱情形，應該讓領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驅策了。但我何能在這個時候，瑣瑣地去絮煩領袖呢？”陳布雷如此在意自己與領袖的關係，這使得他不得不耗用性命來維持與上司之間的關係。往深層次看，陳布雷背叛了所學所知、背叛了自己的軀體與靈魂，他以軀體和靈魂的雙重代價換來了一塊空泛輕浮的“當代完人”匾牌。這獎牌猶如墓碑，也就是陳布雷所服務的那個政黨疎賜的墓誌銘。它連同五十壽辰時獲頒贈的“寧靜致遠 澹泊明志”都不外乎蔣介石的“批語”罷了，雖能反映總裁對下屬的犒賞，但這一切，與民憂無關、與國難無關、與千千萬萬長眠於抗日戰場上的民族魂靈無關。它不過是特殊時期的幾幅墨寶而已。

對於陳布雷仰藥的原因，陶希聖認爲：“……布雷先生死於自悲，而他的自悲，乃是愛國的熱忱與憂國的傷感鬱結而成，他有深遠的見解，堅定的主張，嚴正的批評，強烈的憂憤，但是這一切都鬱結爲自悲的情緒。他就在這自悲的情緒之下謝世了。一年以來，經濟的恐慌，政治的危機，軍事的挫折，嚴重的事件紛至沓來。……而布雷先生本於他二十年的經驗，看透了過去的一切，也就預見了當前的危機。他愛國的熱忱，他憂國的傷感，兩者鬱結而爲自悲的情緒，他毅然決然謝世人而去。”¹⁰

從這篇紀念文章看，陳布雷死於一種“自悲的情緒”，是“憂國的傷感”和“愛國的熱忱”釀造成陳布雷的萎靡自悲。換言之，陳布雷並沒有自殺的傾向，他是一個心理正常、心態健康的人，只不過是層層外因逼迫陳布雷最終仰藥，以求解脫塵世的羈絆——而這羈絆很大部分便是繁重的公告文案與時局逐漸明朗

化的結果。陳氏既能“看透了過去的一切，預見了當前的危機”，實際上他也不難洞悉不久的將來對於“黨國”以及個人意味着甚麼。從職業身份看，陳布雷是中樞要員，但他終歸只是一介書生，一個比普通百姓文筆了得的聰明人。正因此，對於他的自殺，我們沒有必要過分震驚：世間既有千千萬萬人以自殺的方式結束生命，爲甚麼陳布雷就不能殊途同歸呢？

從青年時代崇尚維新運動，稍後參加革命排滿，再到討伐袁世凱，柳亞子的人生旅路與同齡人多有相似。之後與國民黨割席，到私淑列寧，筆下冒出“彌天獨拜馬克思”、“世界革命兩燈塔，延安遙接莫斯科”，則說明柳亞子順應了時代潮流。但是，當我們察覽柳亞子心路歷程時，不難發現，柳氏所鍾情的各種思潮主義，基本上是不假思索地“拿來”的，或者說將自己附麗其上。這固然有時代急速變幻，容不得個體作精密思考的原因，同時也說明柳氏缺乏辨析各類思潮(主義)的能力。他的選擇，實際上是單純的“從勢”：好比一潭池水，水面漂漾着密集的浮萍，一陣風吹過，浮萍便隨風漂移——因爲浮萍沒有根，它只能這樣移走——又因爲物理合力的使然，不可能有一片單獨的浮萍脫群而出逆向前行。柳亞子引人關注，只是因爲在眾多做無根之漂的浮萍中，他是面積略大的一片。

柳亞子佳作頗多，尤以《七律·感事呈毛主席一首》的發表最具轟動效應：

開天闢地君真健，說項依劉我大難。
奪席談經非五鹿，無車彈鋏怨馮驩。
頭顱早悔平生賤，肝膽寧忘一寸丹！
安得南征馳捷報，分湖便是子陵灘。¹¹

起筆直呼“君真健”，盡顯快人快語本色。頌揚既罷，即蕩開話題，以現實遭遇爲基準，引經據典，心中沉鬱寡歡和盤倒出，一股急流勇退的情緒和滿腹怨氣撲面而來。不難想像，在全國勝利可期的特殊階段，柳詩的發表，不啻擲下一枚重鎊炸彈，威力波及，和諧的政治文化空間亦不免爲之搖晃。而毛澤東在收閱柳詩後所答以《七律·和柳亞子先生》：

飲茶粵海未能忘，索句渝州葉正黃。
三十一年還舊國，落花時節讀華章。
牢騷太甚防腸斷，風物長宜放眼量。
莫道昆明池水淺，觀魚勝過富春江。¹²

無疑將“思考空間”擴展到極致，也因此釀就了詩壇一段恩怨、一樁“公案”。

毛詩前半闕以禮相待，客套的敘述層層推進，對柳亞子詩情才藝的讚賞，顯示了一名讀書人的修養與雅量。下半闕詩意則急轉而下，尊老敬賢之情已不復見，面對柳老夫子的抱怨，作者寸步不讓，以一種殊然氣度迎之、待之、瓦解之。最是一句“牢騷太甚”，言尖辭銳，直打七寸，寓意所接，令本該儒雅謙謙的詩藝交流剎那間硝煙四起。其氣氛壓抑凝重，仿若黑雲壓城，教幾代讀者爲之“窒息”，猶有多少詩家學者爲解詩而一籌莫展。

有說柳亞子自命清高，自負才學，懷才不遇，因而要歸鄉退隱的；有說柳亞子陷入了個人小圈子，患得患失而負氣作詩；有說柳亞子自恃才高功高，認為黨和國家給他的政治地位，物質待遇與自己實際貢獻很不相稱，所以要激流勇退、歸隱故里。更有學者直陳“奪席”、“無車”是“牢騷”的主要原因：柳亞子渴望在學術上多做貢獻，但在應李維漢、周揚之邀，出席關於成立文學藝術聯合會的籌委會問題的發言“頗不痛快”，最後竟然未列名“文協籌委會”。因產生意見不被重視和被人“奪席”是柳亞子牢騷之一；在進入北京後的十餘天內，柳亞子曾多次要求派車謁靈孫中山，但這一心願無法滿足，更無人向他解釋“無車”緣由。此為牢騷之二。

研究者的解詩要義，未必就是解讀歷史真相的符碼，能夠有效地為後人祛疑解惑，但卻能為解說歷史添加註腳。兩個月後，毛澤東先是派遣秘書陪同柳亞子拜謁孫中山衣冠塚，繼而宴請柳氏夫婦共進午餐，席間還有朱德等作陪。拜謁總理心願既遂，柳亞子心情大佳，當天的日記載曰：“自揆出生六十三齡，平生未有此樂也。”¹³

陳布雷與蔣中正惺惺相惜，形影不離，給後世留下“聖君賢相”的典範，而柳亞子與毛澤東卻在新政權建立前夕，“揮拳相向”於詩歌舞台。客觀地說，陳蔣“配對”之後的所有故事，並不具備多少噱頭，即便換成趙布雷、錢布雷，也會義無反顧侍立君側兢兢業業——高居廟堂，光宗耀祖，那畢竟是泰半儒士的人生追求。只是聖君賢相可以善始，卻不得善終的結局，尤其是傳說中的掌摑事件¹⁴硬是高高吊起了好事者的胃口，激勵着幾代學人文庫取證，史海鉤沉。

柳毛的“聯姻”，一方面得益於共同的文藝愛好，另一面則輔以柳亞子政治立場的移位，但都不具備陳蔣之間上司下屬、“聖君賢相”的現實條件。而以詩詞為媒介所紐結的友誼，乍看風光耀眼，實則夾雜了太多不穩定因素。好比熱戀中的情侶，一方只沉迷魔鬼身材，另一方則緊盯闊佬的荷包，在婚姻基礎尚未夯實的情況下，即興沖沖相擁步入洞房，高調宣稱“永結同心”、“白頭偕老”——這樣的海誓山盟，徒有演戲成分，卻落不到實處，焉能擺脫崩盤的宿命？聲稱“只當共產黨的諍友，不當共產黨人的尾巴”的柳亞子來自國民黨陣營，他只是對孫總理後繼者背叛“聯俄、聯共、扶助農工”，另起爐灶制定其他政策失望激憤，遭受排擠打壓且被除名的情況下想到擇木另棲。儘管時有“世界光明兩燈塔，延安遙接莫斯科”、“彌天大勇誠能格”等極具價值取向的詩句吐露筆端，但這些詩章只是文人騷客的感性詠頌，而非理性論述。情感受環境制約，登山則情滿於山，入室則蓬蓽生輝。該吟詠時就吟詠，無需望天打掛。思想則來自心底的深刻的理性認識，是掌握積累認識世界之後的知識內化，是在眾多龐雜認識基礎上抽象出來的精華，安能輕易受身外因素左右？

柳亞子著述等身，但關於政黨政治的純理論性文

字並不多見，這說明他對政治缺乏通盤認識。投身革命，長期吶喊，他留下了一個激進式的革命知識分子影像。然而革命性與政治性亦須辨析對待：革命勁頭豐足者，未必就一定精通政治，甚至有可能在政治上極其幼稚。柳亞子既無過人的政治手腕，也缺三起四落般的宦海磨礪，他的政治生活相比擅於玩弄權術的政治工程師何止霄壤。因此，我們應該把這位國民黨元老置換為詩家文人來把握，把他擺放回文藝坐標中來審視，惟有這樣，才具備解剖言說的可能。對於袁世凱等人的倒行逆施，柳亞子頗有預判能力。我認為，這一切實源於創作人的敏感意識，並不說明他擁有非凡的政治眼光。而面斥蔣中正正是總理的信徒還是叛徒、任職總統府秘書三天即憤然出走等極端表現，歸根結底乃天性使然。所謂天性，乃與生俱來的一種精神氣質和生命態度，並不受外力支配，更不能任意伸曲、隨意改變。明乎此，對授人口柄的“牢騷”，我們可以說，即便常備車馬、席位安穩，在太平盛世的日子裏，他還會有這樣那樣的牢騷。我們更可以論定，奪席、無車是“牢騷”的一時主因，而不是根本原因。從詩藝交流到筆鋒駁火，他與領袖之間所形成的“裂縫”與“張力”，令人捏一把汗，以為一段蜜月就此完結。有誰能夠預料到當後者往頤和園益壽堂(柳氏住處)訪晤之後，這裂縫瞬間即得以修復呢？而事實正是如此！“自揆出生六十三齡，平生未有此樂也”，當柳氏筆底再次流淌出這類和諧圓滿字句時，不就有力地說明“裂縫”是源於一時想不通的情緒，一種因失衡的心態導致了提筆諫言麼？難道會是一塊心病，一種淤滯於胸的心靈沉痾麼？

三、蓋棺“復調”說柳、陳

柳亞子和陳布雷在生命歷程的後半段各為其主，扮演著“君側紅人”的角色。各種名譽與光環也在“百年之後”，隨著白馬素車隊伍，在莊嚴肅穆的哀樂聲中緩緩駛向陰曹地府。對柳亞子，官方悼詞以“愛國詩人和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者”稱許。胡喬木《在紀念柳亞子先生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會的講話》：

“……柳亞子先生是一位忠貞的愛國主義者，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者，傑出的革命詩人，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，中國共產黨的忠實的朋友。……柳亞子先生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，是為建立和建設新中國而奮鬥的一生，也是一個進步詩人的一生。……今天我們紀念柳亞子先生，不僅是緬懷先輩，更重要的是學習他那種把畢生獻給民族振興、祖國富強的愛國主義精神；學習他認清歷史方向，隨時代而前進的革命精神；學習他為革命事業苦鬥不屈的奮鬥精神。”¹⁵

再次肯定了柳氏的革命生涯與歷史貢獻。

1948年11月13日，陳布雷留下“油盡燈枯”的遺言，仰藥長別人世。彼時，《中央日報》有如下報道：

“……蔣總統偕夫人於上午十一時步入靈堂，親臨弔唁。總統在陳故委員遺像前，為渠二十多年來之知己，默念約一分鐘，始緩緩退出。總統並挽‘當代完人’橫匾一幅，懸掛靈堂上端，蔣夫人獻鮮花兩束。”¹⁶

部屬同僚也紛紛撰文追思，《記陳布雷》寫道：“……布雷為一極端謹慎之人，不矜誇，不浮躁，雖內心有不可逾越之尺度，其人格亦有不可犯之尊嚴，然待人接物，則一以書生本色出之，既無所謂‘冷冰冰’，亦無所謂‘熱烘烘’。”¹⁷《懷念布雷先生》如此描述：“……他似乎註定是憂患一生，終朝戚戚的。他將自己‘縮小’，俾領袖可無限‘擴大’，位分遵守得非常嚴格，確是一個標準的好幕僚。……他在政治上，也做到了‘清白’二字……兩袖清風，在個人操守上，他是做到了‘廉潔’兩個字了。”¹⁸

柳、陳二人的蓋棺“死”論——無論官方悼詞還是私交文字——可謂哀榮完滿。

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抉擇，積極入世者在於出將入相、輔佐君主，以逞“修齊治平”之志；安於現狀者則失志“著書立說”、“弘文勸教”；至於死心“躬耕壟上”、“採菊南山”者，雖有人在，但幾屬異類。如果不是仕途失意或情感受挫，他們當中是不大可能出現“上不循於亂世之君，下不俗於亂世之民”的身影。知識分子在施展政治抱負的時候，實際上已經步入政治圈子，成為政治人物，從而宣告與知識分子陣營的脫離。南社成員多數屬於儒家型的知識分子，他們未必能夠成為拯救時代的英雄，但都自覺且願意在新舊嬗替的年代承擔責任。他們立社舉事，連同隨後的一系列實踐正是在情感萌動下、在理性支配下展開的。南社主要成員幾乎都加入了反清排滿和討伐袁世凱的鬥爭行列，鍾情並實踐“五步流血式”的暗殺使得他們長袍包裹的彬彬軀體陡然增添了一股俠氣。因此，視這群動盪年代的知識分子為儒俠也同樣合適。儒者沉潛內斂、修己治人，俠士激昂跳脫、除暴安良。儒、俠合而為一的生命形態，就是金剛怒目的陶潛，劍術略疏的荆軻。我以為，某種意義上說，柳亞子的生命形態就是儒與俠的合成。

柳亞子露頭角於南社，他的廣為人識，則要延至任職報社期間的突出表現。之後與毛澤東“粵海飲茶”、“渝州握手”則使他一躍而為社會頭面人物。柳亞子與毛澤東相識相交，主要媒介是詩詞。退出國民黨後，柳亞子的身份就僅僅是一名知識分子，而彼時毛澤東則是政治明星、準領袖。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攀緣，除非是後者對前者詩藝的敬仰，要麼是前者對後者政績的崇拜，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。柳亞子是個文人，但身上殘存着政治元素，毛澤東是個政治人物，但他本質上亦接近詩人。這就使得二人具備了共同語言和默契基礎。柳、毛之所以擦出火花，就是巧妙地借助了詩詞傳遞功能，從而達到統戰目的。二人的交往，實際上迎合了政治局勢和個人喜好之雙重需要。

柳亞子服膺並實踐三民主義。當國民黨當局背離“三大政策”時，柳亞子毅然與之決裂。柳亞子以其知識分子的獨立性，獨立於國民黨專權時代，其文化姿態，更接近魯迅，某種意義上是個“完整”的現代人。在那特殊時期，知識分子階層中有不少具備現代意義氣質的現代人，但他們並不完整——要麼自疏於主流意識，以潔身自好的姿態冷眼看世界，表達無聲抗議；要麼沉潛書齋、埋首學術，以“學術為天下公器”相期許，不敢直面黑暗現實，害怕引火上身。柳亞子沒有退縮，更看輕“明哲保身”原則，相反，在內部矛盾爆發衝突時，他敢與蔣介石叫板，表現了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風骨精神。

陳布雷原先追求獨立，後來服務政治，成為御用文人。文人一旦御用，就意味着他將背棄自我、放棄原初的追求，由此帶來的任何文化行為都只能屈從於現實環境、迎合統治者需要為政治服務。這樣的知識分子，其知識分子的成色已經退居到次要位置，是政治化的知識分子，或者說已經蛻化為政治人物。當知識分子完成了向政治人物的角色轉變時，固有的精神尊嚴和價值取向將難以避免地為政治意識所淹沒、所吞噬。陳布雷既然丟失了知識分子的氣質，當然就不再具備現代知識分子氣質。而不具備知識分子氣質的人，是不夠資格做一名現代知識分子的。

陳布雷選擇走進“機要室”、走入“幕府”，此後他的所有筆墨生涯和文化活動，為只為維護一個政權而已，除此之外，並不具備其它內容。因此，他的選擇，從根本意義上說毫無獨立價值。陳布雷是個才子，一旦握管搖筆，總有“美文”飄臨案前，但他的文告既秉承“委座”旨意而來，難免多為大話空話。所寫的文告，是蔣介石的意願而非自己的主見，他的人生悲劇就在這裏。其人既願意隨塵俗轉，世亦何嘗不可以塵俗之見譽之毀之？陳布雷畢其後半生服務“總裁”，一旦失寵，陷入信任危機，或者違背政治意願而被冷落被拋棄，那麼，他在政治上在社會上都將沒有意義——同行文人忌妒他，政界不再賞識他，而在百姓面前，他又必定污跡在身有口難辯，成了永遠洗脫不掉的“文化敵人”。

相比之下，當審視柳亞子的人生履歷時，我們找不出他的“過失”、“落伍”。柳亞子青年時期就加入革命者行列，在反清排滿時期、辛亥革命時期、討伐袁世凱時期，他始終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。在任何政治形勢下，都能堅持精神獨立，柳亞子的可貴就在這裏。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，柳亞子的政治思想有了重大轉變，憧憬新生活 and 對光明未來的歌頌，使他的作品連同個人形象，浸漫着意識形態氣味。作為舊文化的最後一位詩人，柳亞子沒有刻意追隨潮流，沒有淪為御用文人，他始終不是意識形態的承擔者。在這個意義上說，柳亞子同樣獨立於共產黨時代。從孩提時私撰洋洋萬言上光緒書，到新政權建立前夜的滿腹牢騷語，這位讀書郎，全憑一股書生氣，感情充沛且毫無掩飾地馳騁於時代風雨中。

柳亞子行路不止萬里，歷事何止萬端。他不像陳布雷那般負詬忍謗，或靜夜舔血療傷。這位本該在學術大道上策馬揚鞭的江南才子，一度孤陋寡儔，蹣跚攀爬於政治征途的峭壁。但在任何時候，他都沒有屈服某個政黨。不看他者臉色，藐視普羅大眾的蝸行俗

套，柳亞子獨立不倚向前奔走，他固然沒能開創屬於自己的全新境界，也沒有提出真正與這個世界對舉的價值體系，建構起另一個意義世界，但沒有政治污跡的柳亞子，到底是個清爽乾淨的人。

註釋：

- 1 陳布雷：《陳布雷回憶錄》，王家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89年，第213、208-209、251頁。
- 2 羅炯光：《蔣介石首席秘書陳布雷》，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330、344、342-343頁。
- 3 《磨劍室文錄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。
- 4 石玉坤：《詩詞為媒：毛澤東與柳亞子》，北京：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22、259頁。
- 5 當局派軍警捉拿柳亞子，柳藏身家中複壁(厚牆)得以躲過劫難。
- 6 劉斯翰註：《柳亞子詩選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343、355、443頁。
- 7 同上註。
- 8 同註2。
- 9 同上註。
- 10 同註1。
- 11 同註6。
- 12 劉濟昆編：《毛澤東詩詞全集》，香港：香港昆侖製作公司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152頁。
- 13 同註4。
- 14 傳說陳布雷因進諫而遭受總裁一記耳光。
- 15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：《磨劍室詩詞集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2-4頁。
- 16 王泰棟：《陳布雷傳》，台北：東方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、257-259頁。
- 17 同註1。
- 18 同註16。